

精神的魅力

借书日 表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四月

精神的魅力

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编

封面设计：徐冰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70千字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6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5,001—20,000册

ISBN 7-301-00455-9/1·095

定价：3.60元

目 录

梦萦未名湖(代序)	季羨林(1)
-----------------	----------

第 一 辑

值得感念的岁月	梁漱溟(7)
未名湖畔的三年	冰 心(13)
“但开风气不为师”	冯 至(18)
怀疑与信仰	张中行(24)
我与北大	萧 乾(31)
北大忆旧二题	马 珏(33)
旧燕归来	费孝通(39)
在燕园里成长	侯仁之(43)
一点经历·一点希望	金克木(46)
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	王 瑶(51)
梦魂牵绕忆红楼	杨 沫(57)
北大的“老”与“大”	任继愈(62)
幸运的年月	杜运燮(66)

北大的校风和学风	朱德熙 (72)
西南联大中文系	汪曾祺 (77)
从四位现代哲学体系的创立者谈起 ..	黄枏森 (82)
未名湖(一个电影剧本的原始意念)	黄宗江 (87)

第 二 辑

回忆:迎接黎明	李 瑛(101)
我爱燕园	宗 璞(108)
红楼琐忆	叶祖兴(112)
光明赞·摇篮曲	葛翠琳(116)
共同的心愿	厉以宁(122)
我的选择,我的怀念	乐黛云(128)
动人春色不须多	金开诚(134)
永远的校园	谢 冕(139)
长长的瞬间	严家炎(144)
从北大,我带走了一把钥匙	郭超人(147)
那时候我们多傻	康式昭(151)
寻觅美的小路	孙玉石(157)
我心中的北大	袁行霈(163)
想起老校长	刘绍棠(166)
永远是大学生	汪浙成 温小钰(169)
燕园的黄昏	吴泰昌(175)
爬坡	余树森(180)
母校生活断片	包遵信(185)
从北大到人艺	刘锦云(191)
我的那间小屋	钱理群(195)

不褪色的往事	阎纯德(200)
三位老校长	叶永烈(205)
又一种文明	郭建模(211)
深藏着的歌泣	董学文(216)
属于我的北大	赵 园(222)
并非内幕,也不是新闻	李树喜(226)
未名之雪	徐 刚(230)
北大琐忆	曾镇南(236)
游牧的校园	张承志(242)
悠远的梦幻	李 剑(247)
版纳的月夜	陈晓敏(253)
打翻了的青春亦是青青春色	高红十(258)
圣坛	曹文轩(263)

第 三 辑

默默且当歌	陈建功(269)
眷恋	谢百三(278)
鹊巢思念	王友琴(282)
两处灯火	季红真(287)
也叫“朝花夕拾”	黄蓓佳(292)
演戏	王小平(307)
未名湖是海洋	张首映(313)
社团:北大入开放意识的象征	吕 林(318)
七十年代末那金色的黄昏	李书磊(323)
我生命中的那些时刻	王开林(328)
我们的花地	桑 桑(334)

另一只金苹果 陈粤秀 (338)

我是你水边一只丑小鸭 韩晓征 (344)

十三岁的际遇 田晓菲 (348)

恰值绿意萌动时(跋) 编 者 (353)

梦 萦 未 名 湖

(代序)

季 嘉林

北京大学正在庆祝九十周年华诞。对一个人来说,九十周年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就是所谓耄耋之年。自古以来,能够活到这个年龄的只有极少数的人。但是,对一个大学来说,九十周年也许只是幼儿园阶段。北京大学肯定还要存在下去的,二百年,三百年,一千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同这样长的时间相比,九十周年难道还不就是幼儿园阶段吗?

我们的校史,还有另外一种计算方法,那就是从汉代的太学算起。这决非我的发明创造,国外不乏先例。这样一来,我们的校史就要延伸到两千年来,要居世界第一了。就算是两千年来吧,我们的北大还要照样存在下去的,也许三千年,四千年,谁

又敢说不行呢？同将来的历史比较起来，活了两千年也只能算是如日中天，我们的学校远远没有达到耄耋之年。

一个大学的历史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书面的记载里，在建筑的实物上，当然是的。但是，它同样也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相对而言，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时间是有限的，但它毕竟是存在，而且这个存在更具体，更生动，更动人心魄。在过去九十年中，从北京大学毕业的人数无法统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对母校的回忆。在这些人中，有许多在中国近代史上非常显赫的名字。离开这些人，中国近代史的写法恐怕就要改变。这当然只是极少数人。其他绝大多数的人，尽管知名度不尽相同，也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个人的情况错综复杂，他们的工作岗位五花八门。但是，我相信，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本书中收集的几十篇文章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母校象是一块大磁石吸引住了他们的心，让他们那记忆的丝缕永远同母校挂在一起：挂在巍峨的红楼上面，挂在未名湖的湖光塔影上面，挂在燕园的四时不同的景光上面：春天的桃杏藤萝，夏天的绿叶红荷，秋天的红叶黄花，冬天的青松瑞雪；甚至临湖轩的修篁，红湖岸边的古松，夜晚大图书馆的灯影，绿茵上飘动的琅琅书声，所有这一切无不挂上校友们回忆的丝缕，他们的梦永远萦绕在未名湖畔。《沙恭达罗》里面有一首著名的诗：

你无论走得多么远也不会走出了我的心，

黄昏时刻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

北大校友们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吗？

至于我自己，我七十多年的一生（我只是说到目前为止，并不想就要做结论），除了当过一年高中国文教员，在国外工作了几年

以外，唯一的工作岗位就是北京大学，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占了我一生的一半还要多。我于1946年深秋回到故都，学校派人到车站去接。汽车行驶在十里长街上，凄风苦雨，街灯昏黄，我真有点悲从中来。我离开故都已经十几年了，身处万里以外的异域，作为一个海外游子经常给自己描绘重逢的欢悦情景。谁又能想到，重逢竟是这般凄苦！我心头不由自主地涌出了两句诗：“西风凋碧树，落叶满长安（长安街也）”。我心头有一个比深秋更深秋的深秋。

到了学校以后，我被安置在红楼三层楼上。在日寇占领时期，红楼驻有日寇的宪兵队，地下室就是行刑杀人的地方，传说里面有鬼叫声。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鬼神。但是，在当时，整个红楼上下五层，寥寥茫茫，只住着四五个人，再加上电灯不明，在楼道的薄暗处真仿佛有鬼影飘忽。走过长长的楼道，听到自己的足音回荡，颇疑非置身人间了。

但是，我怕的不是真鬼，而是假鬼，这就是决不承认自己是魔鬼的国民党特务，以及由他们鸠集来的当打手的天桥的地痞流氓。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处在垂死挣扎阶段。号称北平解放区的北大的民主广场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红楼又是民主广场的屏障，于是就成了他们进攻的目标。他们白天派流氓到红楼附近来捣乱，晚上还想伺机进攻。住在红楼的人逐渐多起来了。大家都提高警惕，注意动静。我记得有几次甚至想用椅子堵塞红楼主要通道，防备坏蛋冲进来。这样紧张的气氛颇延续了一段时间。

延续了一段时间，恶魔们终于也没能闯进红楼，而北平却解放了。我于此时真正是耳目为之一新。这件事把我的一生明显地分成了两个阶段。从此以后，我的回忆也截然分成了两个阶段：一

段是魑魅横行，黑云压城；一段是魑魍现形，天日重明。二者有天渊之别、云泥之分。北大不久就迁至城外有名的燕园中，我当然也随学校迁来，一住就住了将近四十年。我的记忆的丝缕会挂在红楼上面，会挂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上，这是不言自喻的。

一住就是四十年，天天面对未名湖的湖光塔影。难道我还能有什么回忆的丝缕要挂在湖光塔影上面吗？别人认为没有，我自己也认为没有。我住房的窗子正面对未名湖畔的宝塔。一抬头，就能看到高耸的塔尖直刺蔚蓝的天空。层楼栉比，绿树历历，这一切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一睁眼，就明明白白能够看到，哪里还用去回忆呢？

然而，世事多变。正如世界上没有一条完全平坦笔直的道路一样，我脚下的道路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坦笔直的。在魑魍现形、天日重明之后，新生的魑魅魑魍仍然可能出现。我在美丽的燕园中，同一些正直善良的人们在一起，又经历了一场群魔乱舞、黑云压城的特大暴风骤雨。这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但愿它也能绝后）！我同一些善良正直的人们被关了起来，一关就是八九个月。但是，终于又像“凤凰涅槃”一般，活了下来。遗憾的是，燕园中许多美好的东西遭到了破坏。许多楼房外面墙上的爬山虎、那些有一二百年寿命的丁香花、在北京城颇有一点名气的西府海棠、繁荣茂盛了三四百年的藤萝，都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被消灭了。为什么世间一些美好的花草树木也竟像人一样成了“反革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犯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自己总算侥幸活下来了。但是，这一些为人们所深深喜爱的花草树木，却再也不能见到了。如果它们也有灵魂的话（我希望它们有！），这灵魂也决不会离开美丽的燕园。月白风清之夜，它们也会流连于未名湖畔湖光塔影中吧！如果它们能回忆的

话，它们回忆的丝缕也会挂在未名湖上吧！可惜我不是活神仙，起死无方，回生乏术。它们消逝了，永远消逝了。这里用得上一句旧剧的戏词：“要相会，除非是梦里团圆。”

到了今天，这场恶梦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我又经历了一次魑魅现形，天日重明的局面。我上面说到，将近四十年来，我一直住在燕园中、未名湖畔，我那记忆的丝缕用不着再挂在未名湖上。然而，那些被铲除的可爱的花草时来入梦。我那些本来应该投闲置散的回忆的丝缕又派上了用场。它挂在苍翠繁茂的爬山虎上，芳香四溢的丁香花上，红绿皆肥的西府海棠上，葳蕤茂密的藤萝花上。这样一来，我就同那些离开母校的校友一样，也梦萦未名湖了。

尽管我们目前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我们未来的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我们今天回忆过去，决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我们回忆过去是为了未来。愿普天之下的北大校友：国内的、海外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什么时候也不要割断你们对母校的回忆的丝缕，愿你们永远梦萦未名湖，愿我们大家在十年以后都来庆祝母校的百岁华诞。“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988年1月3日

作者简介 季羨林 1911年8月生，山东临清人。毕业于济南正谊中学和省立济南高中。1934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大教授和东语系系主任，1978年任北大副校长。现为北大教授。



彼此质疑，相互问难，兼容
并包，追求真理。

在这种气氛中，怎能不奋力
向上！

值得感念的岁月

梁漱溟

我入北大，时北大建校将近二十年，我年仅二十五岁。今值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谨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应教育总长范源廉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方自欧洲归来。我请范公代为先容，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辛亥革命胜利民国建立，1912年蔡先生参加首届内阁为第一任教育总长，而我此时于同盟会《民国报》工作，以一青年记者身份，出入于国会、总统府、国务院及各政党总部，因

此于采访中多次接近蔡先生，但未得深谈。而此次不同，是以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的。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忙回答说：“先生之喜爱哲学我知道，早在中学时即读过先生翻译的《哲学要领》一书，至于我，实在不懂印度哲学。印度宗派是如此之多，而我只不过为解决自己在人生问题上的烦闷，钻研了一些佛典，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先生说：“你说你不懂，但又有谁懂呢？我寻不着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承当。先生于是申说道：“我看你也是喜欢哲学的。我们把一些喜爱哲学的朋友聚拢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么可以不来呢！来北大，你不要以为是来教别人的，你把到北大当作来共同学习好了。”蔡先生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叙说至此，不由联想到近年有关我入北大的一些失实的传闻。1942年在纪念蔡先生逝世两周年一文里我即有所申述，不料四十多年后又再度传播开来，且更加离奇、广泛；大小报刊且不说，虽《北京大学学报》亦不能免。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如汤用彤（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蔡先生以讲师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录取，反被聘为教授之事。

1917年我虽应聘，却因尚在司法部任秘书，一时不得脱身，1918年下半年才到北大。入校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似仍不少。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顾颉刚、孙本文诸位均是如此得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它高校，有的来自社会。盖当时北大对外开放，任人来听课。以我所知，如军界前辈广东伍庸伯先生（与李济深同学）、江苏江问渔先生（后随黄炎培先生工作，是时任工商部主事），皆年近四旬，而天天来听课。湖北张难老先生（湖北三怪之一，辛亥革命中颇有影响的人物），来听课时更是年近五旬了。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人尚且不少，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听课者之踊跃，更可想而知了。于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且影响及于社会。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在讲授“印度哲学”（其中包括佛学）之后，我又开有“唯识学”。但在因爱好哲学而爱好佛学的蔡先生，犹以为未足，先后又请来张尔田先生讲“俱舍论”（代表小乘）、张克诚先生讲“观所缘缘论”（代表相宗）、邓高镜先生讲“百论”（代表性宗），虽时间不长，也未列为哲学系正式课程，却仍可见蔡先生锐意繁荣学术和好学之精神。佛学不属旧学之列，却亦不合于新思潮，因此难免遭非议。此时，于学生纷纷建立之种种社团中，更有“反宗教大同盟”之成立。顾名思义其宗旨自是反宗教。该“同盟”曾组织讲演会，邀请对宗教问题持不同观点者发表意见。我研究佛学、讲佛

学,自是被邀对象。我应邀作了题为“宗教问题”的讲演,地点在三院南河沿室内操场,可容千人左右。记得当时以我到得早些,便由我先讲。从早八点多开始,讲了一上午,意犹未尽,下午又继续讲,待结束时竟日落西山。原安排在同一日的另一讲演人李石曾先生(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当时倡导无政府主义),在台下自早听到晚,最后竟无时间供他发言。听讲者众多,且有耐心,可见对讲演内容感到有兴味。但须知对主讲人观点持反对态度者亦大有人在。如我讲“儒家哲学”时,有学生对旁人说:“我倒要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采取此种态度,实未可厚非。学问学问,学而不问怎能求得真学问。彼此质疑,互相问难,是有益于学术发展的。当时北大此种风尚是极可珍贵亦应加以发扬的。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屠孝实等尝加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那时以陈独秀、胡适之等为代表的新派,多主张全盘西化。陈独秀头脑明晰,笔锋锐利,批判旧派观点,如摧枯拉朽。《新青年》杂志诘问旧派:孔子真精神是什么?价值何在?旧派张口结舌。可是许多旧派先生竟不感苦恼,仍埋头于旧学之中,仿佛彼此并不相碍。学生一如教师,也分新旧。新派刊物名《新潮》,宣传科学精神与民主思想,内容充实而有生气。倾向于旧派的学生办有刊物名《国故》,却只是示人以一堆陈旧古董,根本无力与新派对垒。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